

罗马帝国如何崛起：SPQR 读书笔记之一

熊莹

相较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比尔德更感兴趣的是“罗马如何从意大利中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邦成长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并统治如此之长时间的”。这也符合近年来罗马史研究的一个大势。如比尔德自己所说，自古本以来的将近两个半世纪的罗马史研究，新发现更多地来自看待问题的新视角而非新材料。不同时代的学者带着不同的优先关注和着眼点，使得遥远的过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言说。

玛丽·比尔德 (Mary Beard)，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古典学教授，英国当代最富成就和知名度的古典学者之一。她的履历上有这样辉煌的一条：其本人曾经是剑桥大学古典学专业唯一的女性讲师。在这个男权中心主义最根深蒂固的学科，她凭借一己之力冲破性别藩篱取得一席之地、且成为这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迄今 40 年的学术生涯里，她笔耕不辍，畅游在古罗马历史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出版的著作从《罗马宗教》(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到《古典艺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从《罗马凯旋式》(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再到《罗马人的玩笑》(加州大学出版社，2014)。更值得一提的是，比尔德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古罗马文化的普及教育，使得其影响力大大超越了学术圈。她推出了有关罗马斗兽场和庞贝古城的通俗读物。近年来，她的身影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介绍古罗马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当中。她又是一位公众知识分子和女权活动家，不仅担任了《泰晤士文学增刊》的古典学编辑，还在网上开设了专栏博客《一个教授的生活》(A Don's Life)。其笔锋肆意游走，思接千载，贯通古今，仿佛化身库迈的西比尔女先知 (Cumaean Sibyl)，向现代人源源不断地传递着古罗马人的智慧。她所关心的问题无所不包，针砭时事，月旦人物，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最令人击节赞赏之处在于，她极擅长以古观今，古今相互发明，将时隔数千载、看似不相关的事件用一条意义隐线联系起来。她可以从凯撒的难言之隐谈到现今英国政客的性丑闻，从为古罗马的贩夫走卒发声到为当下的妇女和移民劳工权益代言。2013 年，她因“对古典学术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

街巷、公寓、酒馆、妓院、下水道、坟墓，这是玛丽·比尔德罗马史研究的兴趣点，也是她观察和重现普通罗马人生活最



玛丽·比尔德和她的 SPQR

重要的切入点。自下而上，见微知著，另辟蹊径，不落窠臼，这些成了概括她学术路径的关键词。她的新作《SPQR：罗马史》(SPQR: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Profile Books, 2015)也秉承了其一贯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旨趣。

书名醒目的大写 SPQR 是罗马从共和到帝国名义上的国家最高主权“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拉丁文首字母缩写。这一响亮的标语几千年来都是罗马人最引以为傲的身份和政治遗产，至今仍随处可见于罗马市内的灯柱、铺路石、垃圾箱和下水道井盖上。以它作为书名，显然与本书想要传达的主旨和作者的史观密不可分。正如比尔德自己在“结语”中所说的：“我希望本书不仅是一部‘有关古罗马的历史’，而且是我们与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对话的一部分。”(536 页)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合作共识与对峙抗衡构成了罗马第一个千年的主线，也是理解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历史演进轨迹和荣辱兴衰历程的钥匙。这一标题还告诉我们，它不光是一部有关元老、统帅、皇帝及其家族、那些大人物以及他们宏图伟业的历史，也是一部抒写罗马人民以及他们在罗马大屋檐下喜怒哀乐的历史。

正因为此，比尔德选取了公元前 63 年的“反喀提林阴谋”作为全书的引子和第一章，

这一事件揭示了古罗马政治生活的一些核心特征。不唯如此，有关它的长久争议和讨论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也说明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历史为何如此重要。这一年不但是西塞罗这位共和国标志性人物“最辉煌的时刻”(第一章标题)，也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这对共和双驾马车的内在矛盾凸显和激化之时。因为粉碎了喀提林“企图颠覆共和国”的阴谋，西塞罗被与罗慕路斯、卡米鲁斯(M. Furius Camillus)并尊为对罗马国家有再造之功的“国父”。然而，其对喀提林同党的残酷镇压，也很快被政敌攻击为侵犯了“罗马公民不经民众大会审判不得被判处死刑”的基本权利，西塞罗因此而遭到流放。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从共和建立之初的“平民与贵族冲突”开始，这对矛盾就像阴云一样始终笼罩着罗马。早在“喀提林阴谋”发生的六七十年前，格拉古兄弟就因为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立法改革、触犯了元老贵族的特权利益而遭到同袍的杀戮。所谓的“显贵派”(optimates)与“民众派”(populares)的矛盾贯穿了共和国末年，导致暴力循环和血腥内战，直至伴随共和制土崩瓦解。这一漫长的冲突最终终结于奥古斯都所创立的元首个人统治，只不过其手段并不是形式上的消灭，而是精神上的绞杀。随着“自由”(libertas)的覆灭，无论是元老

院抑或者罗马人民在主权的意义上都已名存实亡。

本书兼顾学术性和趣味性。尽管厚达近 600 页，历史跨度近一千年——起始自公元前 753 年传说中的罗马建城，跨越王政、共和与帝国时期，截至公元 212 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普及公民权的《安东尼谕令》——然而它给人带来的畅快淋漓的阅读感受是专业书籍中所少有的。这自然与其丰富详实的材料以及比尔德非同一般的“讲故事”能力有关。为了不影响阅读的连贯性以及避免学究气和论文体，正文不加一笔注释，有时甚至连被引用古典作家的名字也不出现，这些全部被归到书后每章的注释中做统一说明，行文中也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然而，可读性丝毫不减损本书的学术分量：罗马史中涉及这段时期的所有重大问题几乎无一遗漏，在史料运用及说理论证上也是毫不含糊。由此看来，比尔德在对目标读者的定位上是想将业余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一网打尽。

全书正文共十二章，除了第一章引子之外，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对从公元前 753 年至公元 212 年间罗马的每个发展时期及其核心特征都提出了若干极富针对性的问题。更为特别的是，伴随着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是对一些流传已久的有关罗马人的迷思和误解的“祛魅”，这使得该书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本古罗马通史著作，不断地挑战着我们既有的思维定式。

自 18 世纪末爱德华·吉本提出“罗马帝国的衰亡”命题以来，大多数古罗马通史都将公元 337 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或者 410 年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攻占，再或者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被废作为古罗马帝国历史的结点。比尔德则坦言，她更感兴趣的是“罗马如何从意大利中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邦成长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并统治如此

之长时间的”(17 页)。这也符合近年来罗马史研究的一个大势，从克利福德·安藤(Clifford Ando)的《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与行省忠诚》(2000)到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r Kelly)的《罗马帝国简史》(2006)，探讨的大体都是罗马的成功之处。SPQR 整本书也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将上下一千年的历史串成一线。

二、三章涉及的是罗马的早期历史。罗马在公元前 3 世纪下半叶才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编纂。所谓建城与王政时代的历史，大部分出自公元前 1 世纪以后罗马史家的附会和杜撰，历史与神话传说杂糅在一起难以分辨。现代考古发掘虽然部分地证实了王政的存在，但更多揭示的则是文献记载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巨大鸿沟。罗马广场地下的早期墓葬群表明，至少在公元前 1000 年，罗马的山头已有人类定居，远远早于传说中的建城时间。帕拉丁山上现存最早的茅屋和墓葬遗址在年代上可推定至公元前 8 世纪初，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其与罗慕路斯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罗马城邦的建立，无论在定居模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抑或身份认同的形成上，都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既不存在一个确切的建城时刻，也绝没有西塞罗和他同时代作家所追溯得那么古老久远。

如果说后世的记载无法作为复原罗马早期历史的可靠依据，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建构，比尔德并没有简单地斥为荒诞不经，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罗马人为什么要将建城溯源至一场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悲剧？罗慕路斯将帕拉丁山头的弹丸之地作为容留附近逃犯、奴隶和流民的避难所以吸引招徕人口，这样的传说构建与日后具有鲜明罗马特色的公民权政策(其对非拉丁人、行省人、外邦人和奴隶的开放程度与古典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封闭的